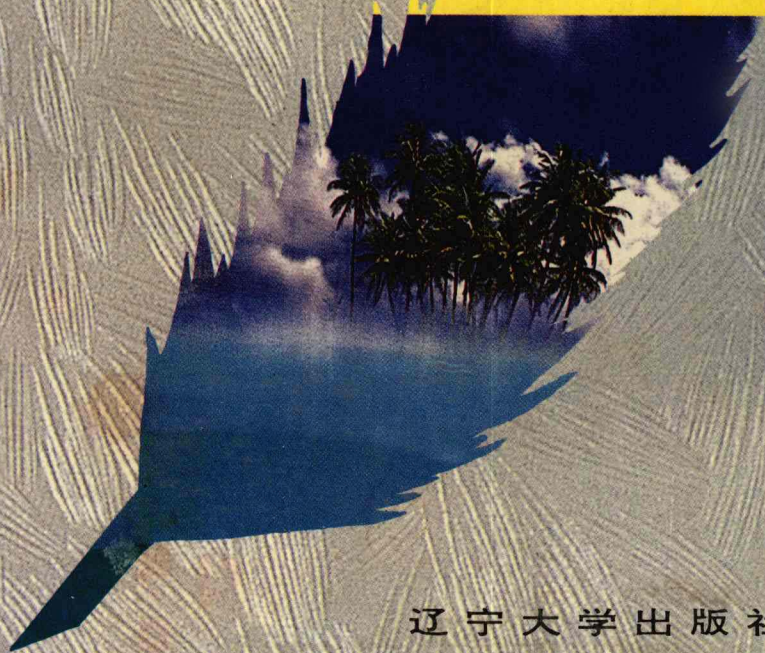


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第三十五种
泰国研究学会丛书第一种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编

姚楠 著

南天餘墨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第三十五种
泰国研究学会丛书第一种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编

南天餘墨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南天余墨

姚楠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50 千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

责任编辑: 李文禄 封面设计: 刘桂湘
特邀编辑: 姚婷婷 责任校对: 何 佳

ISBN 7-5610-2979-9
I·332 定价: 20.00 元

自序

余涉猎东南亚史、中外关系史、海外华人史凡六十五载，稍有心得，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条件有所改善，写作机会较多，故先后撰著、翻译、主编的书刊有十五种，均已出版（详见附录），在此期间，亦曾写过一些短文杂记，发表于国内外刊物，或系情况介绍，或为往事回忆，或作史地考证，或写人物评传，或抒个人浅见，或记异国风光。今因年届耄耋，体弱多病，特将其中若干篇，辑成此集，名之曰《南天余墨》，盖“南天”本有南方之意，而新加坡南洋学会即在1940年成立于其地的南天酒楼，迄今已有五十五载，余为仅存的发起人，故以“南天”作为纪念。至于“余墨”，则可以作为写作的尾声解，若谓之为多余的笔墨，亦无不可。然而一得之愚，可供切磋，敝帚自珍，爰付剞劂。由于题目相近之作，分散发表，内容未免有些重复，但可互为补充参照，故未删改，存其原貌。错误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博雅君子有以正之。

本书出版，承新加坡南洋学会与泰国研究学会热情赞助，谨致谢忱。

姚楠

1994年10月

目 录

自 序	(1)
一、二十世纪中国对东南亚史与海外华人史 的研究	(1)
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加坡华人对东南亚研究 的开拓工作	(20)
三、新加坡南洋学会早期情况与部分创始人简介	(33)
四、泰国研究与南洋学会——为祝贺泰国研究学 会成立十周年而作	(41)
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昙花一现的星洲日报 出版部	(46)
六、中泰友好关系史话	(54)
七、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曙光	(68)
八、中葡早期关系史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96)
九、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及其与新马的关系	(103)
十、新加坡粤侨第一位富翁——陈志生乎？ 陈送乎？	(112)
十一、中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胡璇泽的得官原因	

和政绩评价	(119)
十二、连富光与红溪惨案	(127)
十三、记晚清驻槟榔屿的客属两领事——张弼士 与张煜南	(161)
十四、清廷在南洋设领的第一手资料——薛福成 笔记笺注	(169)
十五、麦都思其人和他对东南亚的研究	(180)
十六、左秉隆与李钟珏	(188)
十七、《郑和航海图》的三次考证	(195)
十八、《海岛逸志》的校注	(199)
十九、《岛夷志略校释》前言	(204)
二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弁言	(211)
二十一、《东印度航海记》序	(216)
二十二、《柬埔寨两千年史》序	(223)
二十三、忆旧话新——重访新加坡随笔	(226)

附 录

1980年至1994年姚楠撰著、翻译、主编的 主要书目	(261)
--------------------------------------	-------

一、二十世纪中国对东南亚史 与海外华人史的研究

首先要说明一下，我在这里把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两个学科有密切关系，本世纪内中国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研究的发展也几乎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研究东南亚史不能不涉及东南亚华人史，因为海外华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据粗略估计，截至 80 年代初，海外华人总数大约有二千四百万人，其中东南亚华人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我想把中国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放在一起介绍，还是可以的。当然，两者不可能合而为一，有时还须分开谈。譬如，海外华人史一般只从 19 世纪末讲起，而东南亚史的研究，就不得不略为追溯到古代。

其次，还要说明一下，我所谈的只是中国大陆方面的情况，对台湾和港澳方面的研究情况，我不熟悉，所以没有发言权，尚有待于其他学者来补充。

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各国早期史时，除了利用当地考古资料和相关史籍外，必须参考中国史料。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国际上被推崇为东南亚史权威的霍尔教授（D. G. E. Hall）讲过一句中肯的话。他说：“要获得关于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有人说，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是“沙漠”，那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一两百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研究组织、资料利用和调查考察等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人和日本人，也许还包括东南亚各国的学者在内。

我在别处已经介绍过 20 世纪以前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本文主要是介绍 20 世纪的情况，对过去的情况只能简单回顾一下。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正史、实录、类书、档案、地方志乃至民间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有关东南亚史的资料。这些资料正在被中外学者所利用，中国学者还在整理汇编注释，取得一些成果。除此以外，还有关于东南亚史的各种专著，我认为大致可分四类：

（一）由中国派往国外的政治使节或其随从人员所写的笔记和回忆录，著名的如三国时出使扶南的朱应和康泰所著的《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元代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以及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所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

（二）到西天求法取经的僧人所写的旅行见闻、著名的有东晋僧人法显所著《佛国记》，唐代僧人义净和玄奘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大唐西域记》等。

（三）航海家、旅行家等所写的游记和回忆录，如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清代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谢清高口述的《海录》和李钟珏所著《新加坡风土记》等。

（四）从事对外工作或接触东南亚史料较多的人所写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明代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和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等。

以上提到的一些专著，只是一小部分。这些资料虽非完全记述东南亚的情况，但其中确有不少宝贵史料。这些专著，有的已有外文译本，有的有中文校注本。可以说，凡是研究东南亚史，包括研究东南亚华人史的，都要用作参考。

顺便提到两本记载海外华人情况的古籍：一本叫做《开吧历代史记》，记载荷兰人早期统治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和当地华人社会

的主要活动，从1610年起一直记载到1789年止，属于编年史性质；一本叫做《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载18世纪中叶华人罗芳伯等在西加里曼丹开发金矿、建立行政组织以及他们与荷兰殖民者对抗的情况。这类书的史料价值很大，而且说明了海外华人的历史决不是始于19世纪末而是很早就有记载，不过华人大量移居海外，应该说是从19世纪末开始。

对于20世纪以前中国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大概情况，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不过我要提醒一下，中国史籍中记载东南亚和海外华人情况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如何选择使用，必须十分谨慎，也须加以分析，否则将会形成错误的认识。

在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不免要同19世纪后期联系起来。那时中国同西方各国的交往多起来，于是像清朝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大臣薛福成等所写笔记中，都注意到了东南亚和其他各国的华人。新加坡华侨所办华文日报《叻报》于1881年创刊后，对当地华人的情况记载更多。但是，这些文章都不过一鳞半爪地谈到海外华人。看来，纯粹论述海外华人的专著只能以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于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最早。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那些在海外称王称霸的华人，将其与西方殖民者相比。虽然严格地说，这篇文章不能算是历史著作，但它至少涉及海外华人史，而且影响不小。它的发表，已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了。到了1910年，日本东京的《民报》发表了一篇真正以“华侨史”命名的著作，叫做《南洋华侨史略》，作者的本名是易本羲，笔名为“羲皇正胤”，他曾在爪哇三宝垄的一所华文学校里教过书，所写的这篇华侨史，依据文字记载和口述材料，大部分涉及荷兰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全文共九章，另有前言和结束语。这篇著作的民族主义色彩很浓。它的基调和以后几十年中发表的华侨史大致相同。有人认为，“华

侨”这个名词的出现和使用，与清末革命运动与保护侨民政策有关，还把“华侨”与“殖民”联系起来。从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到30年代出版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和《中国殖民史》的书名来看，人们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原因在于上述这些书的作者都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指导思想，而实际上中国移居海外，与西方各国的殖民完全不同，因为尽管有人在海外发迹，甚至称霸一方，但他们的出洋，至少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被视为“流寇”或“不遵王法”之人。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不清，我以为作者用“殖民”来作为书名或文章题目是不恰当的，用了这个名词而又要解释中国的“殖民”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不同，就无法讲清楚了。至于“华侨”这个名词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现，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量使用这个名称是在19世纪末以后，对此我无异议，不过“华侨”一词是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特定涵义，我认为还可商榷。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比较容易谈。

首先要提到的是何海鸣在1921年创办的《侨务旬刊》。当时东南亚华侨人数激增，主要是由于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已经明确划分，在殖民地大规模地掠取经济资源，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华工是最合适的对象，因而华人前往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华人在东南亚各地艰苦创业，惨淡经营，有一部分人已致富发达，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社会组织也逐渐健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为数可观，有的华侨还在国内投资创办企业，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那时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为数不少，受到日本人对东南亚研究的影响，对东南亚与海外华人的研究也逐渐感到兴趣。《侨务旬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主持《侨务旬刊》的何海鸣，不是沿海的广东或福建人而是内地的湖南衡阳人，

他并没有出过国，但在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讲过“海外华侨拓殖史”（他用“华侨拓殖”的提法，可能受梁启超和日本方面的影响）。这个刊物的总社设在北京，分社设在上海，并在东南亚的北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马来亚以及美国的芝加哥设有海外分部，联系面较广。它在1921年4月7日创刊，持续四年，共出一百四十一期。内容有通论、侨务新闻、文艺、附录等栏，其中有时刊载一些有关东南亚和海外华人的史料，并出版专辑，如上面提到的《南洋华侨史略》和《开吧历代史记》，就分别转载在该刊第五十九期和第一百二十期。所以说，该刊可以称为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先驱。

接下来就要谈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了。国外学者往往把这个机构称作“南洋研究所”，其实不然，南洋研究所是40年代短期存在的一个机构，后文将要提到。暨大的南洋文化事业部一度还称作南洋美洲文化教育事业部，简称“南洋文化部”，成立于1927年。它的组织比较特别，也不是以研究为主要任务，而是以宣传出版为主，当然在宣传出版任务中，也包括研究工作。它出版刊物，但也研究一些海外情况，最主要的是东南亚的情况。工作人员不算教师，而是职员。该部设主任一人，其待遇相当于大学系主任，其下有秘书一人，编辑和特约编辑若干人，翻译若干人，还有其他工作人员。职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总共约有三十人左右。我本人是在1929年下半年进该部担任英文翻译并协助主任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的。当时的部主任是广东兴宁人刘士木，日本留学生，后来在新加坡和我一道发起南洋学会，并曾两度当选过理事长。编辑和特约编辑中也有几个知名人士，如李长傅就是该部创办时的编辑，编写了好几种有关南洋史和华侨史的专著，包括《南洋史纲要》、《南洋华侨史》和《中国殖民史》等。他在60年代已经去世。另一位编辑陈希文，曾在日本工作过，后来一度

代理过部主任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贵州大学校长，现尚健在，年已八十多岁。特约编辑张相时，写过一本当时很出名的《华侨中心之南洋》，现年已九十二岁，任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还有一位特约编辑温雄飞，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写了一本《南洋华侨通史》，1929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在国内被称为一部最完整的华侨史，他在70年代才去世。与我同事过的人中，学有成就的，据我所知，就是这几位先生，其后的情况不大清楚，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毕生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南洋文化部的主要期刊是《南洋研究》，从1928年创刊起到1944年停刊止，断断续续出版了十一卷，共六十一期，另外出版了丛书三十二种。所以说，这个机构在20世纪上半叶对推动东南亚研究工作是有较大贡献的。

与此同时，在30年代和40年代还有一些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出版。在东南亚史方面译著最多的是冯承钧教授。他幼年出国，先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学习，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科，曾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他在30年代和40年代发表的有关东南亚史的译著很多，有《中国南洋交通史》、《占婆史》、《苏门答腊古国考》、《诸蕃志校注》、《星槎胜览校注》、《瀛涯胜览校注》、《马可波罗游记》、《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以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十多种，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很有用的参考书。此外，北京大学还有两位教授，对东南亚史研究也有较大贡献。一位是张星烺教授，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编，其中涉及东南亚的史料不少。从现在整理古籍的要求来衡量，质量不能算很高，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巨著，已是十分不易，为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提供较多参考资料。还有一位向达教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

长期收集中外关系史的文献资料，著名的著作有《蛮书校注》、《郑和航海图》、《西洋番国志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等，不过这些书的出版，都已在 50 年代了。

在 30 年代还有两本有关海外华人史的书值得一提。一本是刘继宣和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史》，一本是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这两本书分别在 1934 年和 1937 年出版。刘和束合著的那本书所取书名不好，使人容易把华人出国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混淆起来，而且内容也按中国封建王朝分期，实际上著者的观点同梁启超等是一致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影响很大，我本人在 40 年代初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做《马来亚华侨史纲要》，一本叫做《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也是这样写的，现在看来，这种写法不妥当，资料价值也不大。陈达教授那本书的写法，是用社会学角度研究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着重调查研究，这种写法，为后来研究海外华人史工作者起了先驱作用。1940 年，这本书由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翻译成日文出版，列入“南洋华侨丛书”。同年在纽约出版了一种英文本，题为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不仅中国国内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开始有所发展，而且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与新加坡之间的研究工作，开始交流促进。最显著的例子是新加坡《星洲日报》的创刊，差不多同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成立是在同一时期。《星洲日报》创刊那年，恰巧是我进暨大南洋文化部的 1929 年，那时这个部成立才不过一年多一些的时间。当时《星洲日报》的经理林鬯民和总编辑傅无闷都很重视东南亚研究工作，他们与暨大南洋文化部保持着密切关系。1930 年和 1931 年，《星洲日报》出版了创刊一周年和二周年的纪念特刊两册，每册的篇幅多至六七百页，刊登的文章绝大部分与东南亚研究有关，其中有

好多篇是暨大南洋文化部同仁的译著。到了 30 年代末，新加坡华人研究东南亚的兴趣更加浓厚，表现在老资格的《南洋商报》与创办不久的《星洲日报》都出版了大部头的年鉴。《南洋商报》出版的叫做《南洋年鉴》，《星洲日报》出版的叫做《星洲十年》。前者介绍整个东南亚情况，后者以介绍新加坡十年来的发展为主，兼及整个马来亚十年来的概况。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主要编写人都是从中国前往新加坡的。《南洋年鉴》的总编辑名义上是由《南洋商报》当时的总编辑傅无闷（从《星洲日报》调去）兼任，实际的主编是原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的郁树锷。《星洲十年》的主编名义上是由《星洲日报》总编辑关楚璞兼任，实际上却由我主持编委会工作。

以此为起点，中国与海外华人对东南亚研究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我在《星洲日报》同事而且合作编写《星洲十年》这本书的，有两位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极感兴趣。一位是后来在新加坡成为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的许云樵教授，一位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执教的张礼千教授。我们把《星洲十年》这本书编完后，继续在报纸上编辑出版三种副刊，先是编辑《南洋史地》和《南洋经济》，每天轮流出版，后来又把这两种副刊合并为《南洋文化》，天天出版，占日报的半版篇幅，同时成立出版部，由我任主任编辑，张、许两位任专任编辑，打算除编辑副刊外，再出版一套南洋丛书。但因种种关系，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星洲日报社的出版部不久就夭折。

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星洲日报出版部即将夭折之前，经过新加坡华人学术界的努力，成立了海外华人第一个东南亚研究学术团体——新加坡南洋学会。由于这个学会后来对中国国内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这里把它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学会在 1940 年 3 月成立，

原名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1958年才把“中国”两字去掉，称为新加坡南洋学会，成立迄今，已有整整四十六年历史。学会创始人七人，绝大部分是当时《星洲日报》的编辑人员，除上面提到的张礼千、许云樵和我外，还有该报总编辑关楚璞和文艺编辑郁达夫。另外两人，一位是前面谈到的原暨南大学南洋文化部主任刘士木，一位是南洋史专家李长傅（他在国内）。这七个发起人中，除我尚在世外，其余六人都已去世。第一届会员除上述七位发起人外，还有十二人，分处国内与东南亚各地。南洋学会经过会友的辛勤工作，惨淡经营，在这四十六年中出版了《南洋学报》四十卷，南洋丛书二十余种，现已在新加坡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并列为当地两大学术团体，会员包括全世界各地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工作者。香港方面，也有不少会员，如郑德坤、陈荆和、饶宗颐、郑子瑜教授等，现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也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并曾在1958年继许云樵教授担任过学报主编。我在南洋学会只主持过早期会务，包括日本占领新加坡时学会迁设中国重庆的那个阶段。新加坡建国后的会务，主要是由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些会员们主持，不过近年以来，我仍能与学会保持联系。关于南洋学会的创立和发展情况，我另有一篇文章介绍，这里不再多说。我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这个学会对中国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

南洋学会成立后不到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和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张礼千先后回国。由于新加坡沦陷，我们把学会暂时迁设在重庆，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同时，经过学会同仁的建议和筹备，重庆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合办了南洋研究所，于1942年3月成立。这才是中华民国时期唯一研究东南亚的正式机构。它的主要研究员几乎都是南洋学会的第一届会员，即张礼千、朱杰勤和我。学会迁设重庆期间，曾得到商务印书馆和国内学术界的

支持，出版了丛书八种，其中著名的有《缅甸史》、《暹罗史》、《郑和航海图考》、《古代南海史地丛考》等，还为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南洋专辑”一期，这些书刊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另外，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由教育部设立了一所教授东南亚各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语言的高等学校，名称是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和张礼千曾先后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原来的南洋研究所撤销，其图书设备并入该校，后由该校设立南洋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并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现在这个系里有七位教授是东方语专的毕业生，他们之中有几位是研究东南亚史颇有成就的学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就曾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专论，呼吁政府设立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当时政府因为建国不久，主要力量集中用于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对此尚未能顾及，但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就在1956年由厦门大学设立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设立东南亚研究室，开始进行东南亚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工作。所以说，中国国内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实际上同东南亚华人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估计今后还将会有密切的合作。

在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中国内部政局动荡不定，经历了十年内乱，学术界受到严重影响，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直到70年代末，才又蓬勃发展起来。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与有关方面对周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变化都十分重视，于是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团体的成立，犹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大专院校历史系与国际政治系讲授的东南亚史和华侨史的课程不计外，正式成立的组织有二、三十个，其名称如下：

（一）福建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东南亚

研究室，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史研究室，华侨大学华侨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华侨研究所。

(二) 广东省：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室。

(三) 云南省：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室。

(四)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

(五) 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华侨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东南亚研究室。

(六)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研究所华侨历史研究室。

(七) 河南省：郑州大学历史系印度支那研究室。

(八) 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广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等等（各省市侨联附设的华侨历史学会很多，不备录）。

这些机构各有出版物，如学刊、期刊、通讯、论文集之类，为数不下三、四十种。就研究人员的数目而论，截至本文执笔时止，以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为最多，共有五十四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居第二，共有四十五人；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占第三，共有二十七人，其余各机构的人数，从三、四人到十多人不等。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近几年中国出版的有关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书刊。这些书刊大体上可分四类：

一、期刊、丛刊和通讯

上面谈过，所有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机构都有各自